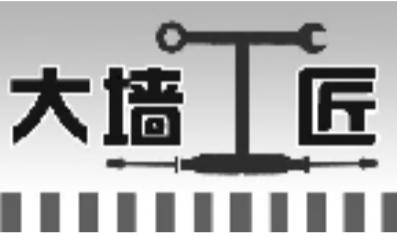


做好当下的事,时间会有答案

当记者遇上不健谈的他



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赵家峰

工作41年,浙江省第五监狱医务民警俞新芽是同事们眼中的“老黄牛”。几十年来,他从在监外医院做好民警职工、家属和附近群众的医疗服务,到转入监内医院为罪犯进监会诊、急诊抢救和手术治疗,几乎随叫随到,未曾出错。“俞医师什么都好,就是内向,你采访他,估计要费大功夫。”一旁的民警告诉记者。

早上8点半,在会议室等了几分钟,记者见到刚结束病房查房的俞新芽,推门而入的同时,伴着一声轻轻的“不好意思”。他一头灰白发,打理得很精神,步伐却略显局促,坐定后,他的身子又远离记者侧了侧,紧接着双手交握放在腿上,“记者好,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”他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要做这样的人

话匣打开得很常规。1983年,俞新芽进入监外医院工作,还是医师助手的他站在一旁,观察医师认真看诊、仔细手术的样子,“当时带我的医师姓尹,我想着,我也得

像他那样。”

俞新芽的想法,用他的话讲,只是想把这份工作做好。记者翻阅过他的资料,里面写到,在监外医院工作的20多年,除了认真做好广大民警职工、家属和附近群众的医疗服务外,他还多次半夜为发高烧的老人和小孩出诊。此外,俞新芽还为监内罪犯会诊、急诊抢救和手术治疗,曾多次夜间为罪犯实施阑尾切除术。

“那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记忆吗?”然而,当记者问起时,他只是不停转着手指,脸还是侧着,“好像也没什么。”

俞新芽只想起那时深夜的手术台,手术器械消毒得用炉子,煤炭烧起来,墙上的时钟被烟雾拢住。

睡不踏实的绿皮火车

2003年、2010年、2012年,俞新芽的记忆都和绿皮火车有关。晃晃悠悠的火车载着调遣的罪犯,他和另一个医务民警负责全车厢罪犯和民警的医疗保障任务。

俞新芽需要每天巡查10节车厢,为罪犯量体温,测血压,询问病史。两个医务民警轮流值班,睡在车厢和车厢的间隔处。“轮到晚上值班,偶尔闭下眼睛也得记得把耳朵支起来。”

“家里人担心吗?”

“这有什么担心的,都是工作。”俞新芽很爱把“这是工作”作为一切问题的回答。“火车真得很慢,但是等你来回把罪犯一个个巡查完,这一天时间过得也差不多了。”

他们没什么不一样

2008年,俞新芽转入监内医院工作,诊治的对象完全变成了罪犯,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诉求变多了。“肚子胀了,腰疼,喉咙痛,都会来找我。”俞新芽坦言,这些都是小问题,对身体没什么影响,但是只要罪犯来看病,他都会耐心解答。

时间长了,罪犯都很喜欢找他看病,“俞主任在吗?”“俞主任,你帮我看看,我这个情况没事吧?”

“你还记得这些罪犯吗?”

“几乎不记得了,我也不再去多问罪犯的事。”这次,俞新芽照样用“这是工作”来回答记者,他又转了转手指,似乎对自己不变的回答有点不好意思,“医生就是治病救人,没什么区别的。”

记者手记:

采访俞新芽的时间不长,一个多小时,但问题的密度却很高,因为俞新芽给的反馈很少。采访结束,他的同事惊讶地说,“你怎么能和俞医师聊这么久?我们平常跟他能说上20分钟都是奇迹了!”

大墙工匠有很多的定义,大多数时候,跳入脑海的是那些身有奇技的民警,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舞台上各显神通。可像俞新芽一样的人,却是监狱民警的大多数,他们把这当工作,却又让这份工作成为自己的生活。

40多年的工作生涯,俞新芽未曾计较过得失,双休日值班,积极顶班是他的常态,即使是当了门诊部主任,那9年里,春节排班的时候,他永远把自己排在第一个。

这篇报道,读起来或许是淡淡的,但平凡的人,做着平凡的事,尽职尽责的人生,也能泛起抚慰自己的涟漪。用俞新芽的话说,“该做的都做了,没什么遗憾就好。”

走近

“另一种人生”

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赵栋

日前,余姚市司法局组织部分在册社区矫正对象赴宁波市黄湖监狱,开展“走近‘另一种人生’,沉浸式体验‘高墙里的生活’”警示教育活动,增强社区矫正对象遵纪守法的意识和服从监管的自觉性。

教育活动中,社区矫正对象听取了监狱民警的集体讲评,认真参与队列训练,参观生活监舍,“零距离”体验服刑罪犯的改造生活。

“以前总觉得监狱是离我很遥远,以为自己年纪小,不懂事,就可以随心所欲,现在才发现自己半只脚已经踏进监狱了,今后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,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!”当天,刚好是社区矫正对象小张满18周岁的第一天,这次进监警示教育也是他难忘的特殊成年仪式。

警示教育会上,监狱罪犯高某现身说法,讲述自己在监狱服刑的心路历程,表达了对重获自由和回归家庭的渴望,触犯法律红线的忏悔。会后,社区矫正对象纷纷在现场的感悟板上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。

“本次活动以教育为主、惩戒为辅,让社区矫正对象设身处地地感受高墙里的生活,也有力震慑了部分悔罪意识不到位的社区矫正对象,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、和谐稳定的社区矫正环境。”余姚市司法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韩立波介绍。

十年前,他签下遗体捐赠协议 如今,他将光明与爱留在人间

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章梦杰

日前,86岁的刘清津同志因病离世,同日,进行了眼角膜和遗体捐赠。刘清津曾是杭州钱江水泥厂(杭州市西郊监狱前身)副厂长,后来,钱江水泥厂改制为杭州第一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后,他又历任副支队长、支队长。1997年9月,刘清津以杭州市西郊监狱副监狱长级调研员身份退休。

近日,记者来到刘清津家中时,望眼四周,朴素干净,只有为看病专门准备的材料袋还搁在沙发上,他的爱人程银仙说,“他怕麻烦,我们也一切从简。”

“记得把它带上”

今年3月,刘清津不幸被检查出恶性肿瘤,此后,他开始频繁住院。每次去住院,他总是要嘱咐爱人,“记得把我的遗体捐赠

证明带上,万一用得上。”

2014年11月,刘清津和程银仙同浙江大学医学部签订遗体捐赠协议,愿意为医学教育、科研事业无偿捐献遗体。

“这件事情,其实好多年前我们就想做了。”程银仙回忆,那时候喜欢看报,看着报纸上刊出的遗体捐献的故事,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一次,去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参观的时候,两人看到医学部竖起的“无语良师碑”(医学界把志愿遗体捐献者称为“无语良师”),中间的石碑上篆刻着对遗体捐献行为的立碑意义,两侧石碑上则是遗体捐献者的姓名。“为科研事业出一份力,我俩当时就互相看了看,他说他要捐,我说,好,我也捐!”程银仙说。

病情来得突然,也恶化得很快。捐赠遗体那天,程银仙一直在哭,“手一直是抖的。”即使这样,她仍然记得和医生强调,刘清津是要器官捐赠的,一定要遵从他的遗愿。“医生说,他的眼角膜很好,将会给一个等待捐赠的人带来希望。”程银仙打开手机,给记者看了看医生给她发来的感谢信。

“我怕麻烦别人”

程银仙又回忆起那段彻夜陪床的日子,“那时候,我们总想先瞒着他,他其实都知道,他也不表现出来,生病之后,只觉得是给我们添麻烦了。”

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,刘清津是一个很怕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。程银仙回想起爱人去世当天,他身体突然不适,两人收拾



东西就急忙赶去医院,刘清津和她强调了好几遍,别坐出租,“他说他怕自己吐人家车上,人家还得收拾车子,赚点钱不容易。还是坐公交,窗户开开,可能不太会吐。”程银仙讲起来,眼眶还是红的。

“我爸就是这样的人。”一旁坐着的刘峰想起小时候听到的关于父亲的故事,那时候刘清津已经是管教支队长,但大家还是习惯叫他“刘厂长”,作为水泥生产方面的行家里手,刘清津曾有相关论文在省、市有关刊物刊登发表,对水泥厂相关设备的改造、技术资料的保存、归档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有一次,监狱一个地方正在维修,很深的坑,刘清津二话不说跳了下去,跟着维修工人一起排查故障。在不少老同志看来,刘清津一直是个专精技术,生活朴素的人。

“我想着,他的眼睛会去需要的地方,继续发光发亮。”程银仙说,她会和老伴儿一样,遵守这个承诺。

